

创纪录的《河边的错误》做对了什么?《三体》《超新星纪元》的电影版改编正式官宣,顶流作家示范如何“破壁”

余华动能,刘慈欣势能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

“10月,中国电影多了一个余华谱系,新添一个刘慈欣宇宙。

随着电影《河边的错误》10月21日上映,这部晦涩的先锋小说终于被搬上银幕,票房单日破5000万元,预计票房破3亿元,更重要的是,余华作品滋养了从“第五代”导演张艺谋到新生代导演魏书钧的创作,为影视产业注入文学动能,形成了由《河边的错误》(魏书钧执导)《福贵》(朱正执导)《文城》(腾讯视频开发)组成的余华小说影视改编谱系。

10月在成都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上,刘慈欣两部代表作《三体》《超新星纪元》的电影版改编正式官宣,加上已经进入后期制作的科幻剧《球形闪电》(陈思诚监制)、尚未开拍的《流浪地球3》(郭帆执导),影视界将迎来一波科幻冲击。刘慈欣以一己之力制造了科幻文学向科幻影视的转化大势,难怪有评论人士戏称:没有什么科幻产业,只有刘慈欣产业。

从“面壁写作”到“影视破壁”,这个过程不仅让晦涩的先锋文学、硬科技的科幻文学变成了票房和流量,也让作家逐渐成为类似网红的存在。余华被粉丝昵称为“潦草小狗”,刘慈欣也有专属称号“大刘”,余华《活着》累计销量突破两千万册,刘慈欣的“三体宇宙”拥有2.6亿粉丝。“面壁-破壁”的过程,是作家“下凡”的过程,也让严肃的内涵、长期主义的文学内容注入影视,形成了对时代精神的转译、观照。



《河边的错误》电影海报。



《河边的错误》原著作者余华



即将登上大银幕的《三体》和《超新星纪元》原著作者刘慈欣

严肃文学的穿透力

自1895年电影诞生以来,文学就是影像最有力的推动力量。

统计显示,国产影视的改编内容与原创故事比例为70%;30%,70%的改编故事里包括文学、漫画、翻拍和新闻报道,这其中文学改编占比一直较高,国产电影票房前100部里,30部源自小说改编(2019年数据),其中包括《流浪地球》《长津湖》等里程碑作品,而《霸王别姬》等口碑神作更是改编自经典小说。有了这样的数据,就可以理解导演们对文学作品的执念——《河边的错误》的影视改编权先后被五次买走,张艺谋、陆小雅、魏书钧三位导演接力,终于把这块“难啃的骨头”啃下来了。

《河边的错误》之所以备受关注,不只是3个亿的票房,还在于它与《永安镇故事集》的鲜明对比。

两部电影都属于文艺片,皆由魏书钧执导,分别在9月、10月前后脚上映,《永安镇故事集》票房累计320万元,《河边的错误》3亿元票房,差距近百倍。要知道,《永安镇故事集》入选过戛纳影展双周单元,就电影质量来说与平遥影展最佳电影《河边的错误》不遑多让。《河边的错误》如此成功,原作余华、男主角朱一龙的加持功不可没。余华盛赞魏书钧版《河边的错误》“超越原作”“不看两遍可惜了”,为这部电影的品质背书。

余华睿智的谈吐和幽默的段子构筑了独特的个人魅力,他如何从牙医变成了专业作家,如何扛着好友史铁生的轮椅参加球赛,如何在欧洲列车

上遭遇“勒索”,都成为广为流传的段子。当下的余华已然成为严肃作家里最有流量、最有粉丝影响力的存在,连诺奖作家莫言都调侃道:“余华的作品少我一半,影响力多我一半。”余华透露,购买《河边的错误》的当当影业已经买了他另一部小说的影视改编权。

影视公司如此倾心名作家,难道说严肃文学的改编热潮回来了?

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宋方金既是作家也是编剧,他非常熟悉文学的影视改编。“从2014年、2015年开始,影视界大量地改编过去20年的网络文学版权。从2017年开始,影视界的注意力慢慢回归严肃文学,《红高粱》《白鹿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纷纷改编成影视作品,一直到陈彦的《装台》、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尤其是去年《人世间》《北上》两部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改编,让观众看到了影视向严肃文学的回归。”宋方金认为,“文学应该而且必然是影视的强有力的支撑,网络文学是一个辅助性渠道不应该是主流渠道,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把网络文学当成主菜,导致影视创作的文学味道急剧下降。而最近不论电视剧还是电影,文学内容的加持实现了文学性回归,体现了严肃文学的穿透性和力量。”

云在青天水在瓶

把作家比作母鸡,把小说比作鸡蛋,传统读者通过鸡蛋的滋味来理解母鸡。然而,在视频时代,粉丝追捧母鸡,却对鸡蛋丧失了兴趣。

余华感慨,自己写过武侠小说《鲜血梅花》,写过侦探小说《河边的错误》,写过才子佳人小说《古典爱情》,但是读者好像只知道《活着》。即便是刘慈欣,他的海量作品里被读者熟知的也只有《三体》《流浪地球》等寥寥数本,被影视改编的更少。至于跟刘慈欣并列“科幻四大天王”的王晋康、何夕、韩松也并未得到科幻圈外读者和影视界的足够重视。

顶级科幻小说版权当下的价位在百万元区间,远逊于当红网络小说千万级别的版权费。不过,对于科幻作家来说,更致命的是科幻影视生产力的不足。专门拍科幻的导演屈指可数,郭帆之外,路阳《刺杀小说家》、张吃鱼《独行月球》、陈思诚《外太空的莫扎特》等都有其他类型电影的拍摄工作。专门写科幻的编剧也是稀缺,而科幻需要一定的制作规模和高度的电影工业化。当下的电影工业尚未消化科幻文学所提供的内容,而且有限的生产力集中在刘慈欣身上,自然会造成科幻粉丝与科幻影视之间的期待脱节。

对照国际,科幻影视与科幻文学的强关联由来有自。科幻大师莱姆的名作《索拉里斯星》1972年被塔科夫斯基拍成经典电影《飞向太空》,2009年又被索德伯格再次拍成《索拉里斯星》,被誉为影史最具哲学性的科幻力作。菲利普·迪克小说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》成为《银翼杀手》《银翼杀手2049》两部电影的母本,也是影迷的必修课。“黄金时代三巨头”的作品持续被改编,阿西莫夫巨著《基地》已经推出两季,阿瑟·克拉克《3001:太空漫游》也即将推出迷你剧集。

科幻IP的深度开发,一方面与科幻作品文本绑定,同时也与时代特征绑定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《三体》《流浪地球》的开发仍然任重道远。

好的影像与好的文学互相促进,也有互相“带货”的功能。《河边的错误》上映后,很多读者回头读这部小说,而《流浪地球》爆红之后,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也成为书店的畅销书。

正所谓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,好的文学、好的故事可以随不同时代需求而变化生发,通过不同的介质以不同的形式跟受众交流。

好故事一直稀缺

熟悉张艺谋的编剧发现,这位拥有当下最好创作班底、故事资源的大导演每次见面都会感慨:“没剧本啊,我现在缺剧本啊。”

不只是张艺谋,从李安到昆汀·塔伦蒂诺,大导演对好故事的渴求是一致的。

当下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强,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观众从各种渠道获取到多种多样的信息,一个简单好看的故事已不能满足大众。短视频只需要单一的物理性的冲击力,而电影必须是化学性,和观众产生心灵共鸣。电影需要有“必看性”,导演讲故事要强大到足够的程度,才能让影迷愿意驱车到影院里坐两三个小时,顺便吃顿饭,耗费整个下午的时间。然而,这样的故事并不多。

开掘出让导演满意的故事,也是作家的要务。业内有一个著名的典故:姜文将叶弥小说《天鹅绒》改编成《太阳照常升起》,叶弥只收了三根北

京萝卜版权费。三根萝卜也体现了作家与导演的情谊。

在擅长影视转化的作家里,刘震云别具一格。他的《温故1942》是一部调查体小说,最后被冯小刚改编成电影《1942》。他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就是各色人等不断说话、不断寻找,缺乏故事性,仍然能改编成电视剧。刘震云的小说里贯穿着他独有的辩证法,远与近、轻与重、大与小在他的故事里不断变幻。《一地鸡毛》里,小林买的豆腐馊了,在小林看来,这块豆腐比什么都重要。轻重、大小、缓急在刘震云作品里随视角而变,这种哲学底蕴才是原作者折服导演的缘由。

一个好故事的出现,也需要踩着时代的步点。张艺谋1992年遇见又放弃了《河边的错误》。现在看来,《河边的错误》与1992张艺谋的创作谱系不相通,他的电影一直关注民族性、关注人性,直到2020年,晦涩阴郁的《河边的错误》遇见了魏书钧,魏书钧抓住了小说的“戏仿”核心,真正破解了余华的文本。像是《流浪地球》《三体》等科幻题材的爆发,适逢中国载人航天领域不断取得辉煌成就,观众见证了“科学”,才相信科学基础上的“科幻”。

“我其实认识很多比较小的国家的科幻作家,他们写得都很好,但真正要被人们所熟知,还得在英语世界去发表,就是说,科幻只在那些快速发展的国家、地区才能够取得发展。”在2023世界科幻大会上,刘慈欣坦言,科幻最深层次的推动力来自时代。而这些随时代而来的故事,也为创作者和观众留下独一的时代擦痕。

名人汇

双重身份,各有千秋

——专访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宋方金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

面对观众,因而,编剧的宿命感特别强。所以说,一个成功的编剧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编剧(可能是靠其他人的辅助之功),而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一个成功的作家。”

大作家的高姿态

《清明上河图》(2015年)《上元灯彩图》(2023年)是宋方金连续推出的两部小说,显示出他驾驭古典题材的创作技巧。“我们现在有相机,而古人只有绘画。传世之图往往隐藏着强烈的情感和丰富的信息,具有很高的故事价值。这两张‘图’是我观察古代世界和古代社会的重要入口。”

身兼编剧和作家两职,宋方金清晰地意识到创作权与改编权的分野。“这一两年,我和不同的导演聊这两幅‘图’,我对导演的期许是遵循我的原著主要情节和走向。这次,余华为什么说《河边的错误》改编得好,实际上,魏书钧导演颠覆性地

修改了小说,但他保留了作品的内涵。之前拍《红高粱》时,莫言对张艺谋说:‘你就是让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造原子弹都可以。’这就是大作家的态度:我不在乎你是否照着原著去拍,只要遵循小说的精神就可以。这种高姿态也能让导演和编剧放开手脚。”

创作还是需要纯粹

宋方金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,他对影视与文学之间的转化有着深入观察。

宋方金认为,文学与影视分为三种对应关系。“一类文学作品集中呈现人与内心、人与自我矛盾冲突,特别容易改编成文艺电影、艺术电影,比如《河边的错误》;另一类集中表现人与人的矛盾冲突,特别容易改编成电视剧,比如《人世间》;还有一类着重表现人与自然、人与大环境的冲突,特别容易改编成类型电影或者动作片。”宋方

金说。

确如宋方金所言,作品同样出自余华之手,《活着》的影视改编大多遵循原著小说的主要人物关系、主要人物命运走向,至多给人物加入一些零杂活儿——比如,张艺谋给福贵加入了皮影戏的戏份,使得剧情更加视觉化。《河边的错误》的改编则需要天翻地覆,只保留先锋的气质和感觉,呈现出文艺片的质感。

创作完成《功勋·袁隆平》,宋方金正在忙于新的创作。“写完袁隆平先生,我对中国粮食行业和种子科学家比较感兴趣,计划写一部以农业科学家为题材的电视剧《中国饭碗》,同时还在写一部战争题材电影。”宋方金说,行走在作家和编剧两个领域,不可避免地遇到创作频道的“调适”。

宋方金具体解释说:“小说、剧本各有各的创作规律。举例说,《红高粱》拍完后,张艺谋与莫言的合作意犹未尽,希望再做一个大手笔的电影项目。莫言马上写了一部《白棉花》,然而,这部小说



宋方金

在他的创作作品里评价不高,张艺谋也觉得不适合拍成电影。这让我们思考:《红高粱》不是为电影而写,却特别适合拍成电影;《白棉花》专门为电影而写,却特别不适合拍成电影。小说如果具备了较强的原创性、故事性,确实适合改编成电影。但专门为了电影写小说,很可能被电影的某种视觉追求和画面感所俘虏,所以,创作还是要纯粹些。”